

论实现公平的效率

林 晨 廖逸涵

[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当存在市场失灵和个体差异时,公平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效率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科学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为了有效率地实现价值观决定的社会福利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去除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关键词] 公平正义;效率;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福利经济学框架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是经济社会的政策目标。在我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基础和福利目标。理论上,在完美的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根据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效率和公平是能够实现统一的。但在脱离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如何有效率地实现社会的福利目标,则成为一个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旨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实现公平的效率的理论机制

20 世纪 50 年代,肯尼斯·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在建立一般均衡范式时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②: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竞争均衡即是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意味着这一经济体已经实现了最优效率。如果再加一个前提,即经济体中的个体都是同质的,包括一致的禀赋条件、一致的偏好,这个竞争均衡还会带来均一的分配结果,即经济体中的每个个体拿到完全一样的收入,获得完全一样的效用。无论立足于何种关于公平的价值观,例如效用主义、广义

作者:林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c_lin@ruc.edu.cn;廖逸涵,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yhliao@ruc.edu.cn。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赋能北京高质量发展研究”(21JJA040)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3 页,人民出版社,2024。

② K. J. Arrow, and G. Debreu.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1954, 22: 265-290.

效用主义抑或是罗尔斯主义，这个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如果用福利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不管社会福利函数是线性、固定弹性还是列昂惕夫型的，这一结果都实现了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因此，完全竞争和同质个体的前提条件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世界。对完美世界的描述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对这个完美世界的性质，经济学界鲜有争议。然而，如何从这个完美世界走向现实世界？无论是假设出发点还是政策落脚点，经济学界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争论不休，也因此衍生出林林总总的各家学派。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述从一个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完美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的种种争议。简单来说可归结为，从放松个体同质条件出发的什么是公平与如何实现公平的争论，以及从放松完全竞争条件出发的如何实现效率的争论。

从上述完美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关键在于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所谓实现公平的效率，指的是实现社会价值观所定义的福利目标的效率。追求这一效率的过程并非简单地追求经济产出的增加，而是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价值观定义的社会福利目标，将“公平”内嵌于“效率”的考量之中。理论上，如果同时满足完全竞争与个体同质条件，竞争均衡状态既是帕累托最优的，也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然而，在放松个体同质条件后，效率和公平之间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尽管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给出了帕累托效率的内涵与条件，但是并未对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进行限定。只要无法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任何人的境况，那么即使是收入极化情形也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那么，在放松个体同质条件的情况下，效率和公平能否实现统一呢？答案是肯定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表明，在经济主体偏好被良好定义的基础上，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调整初始资源分配状态，并结合竞争性市场机制来实现。因而无论内涵是什么，社会公平总能够通过适当的分配过程来实现。进一步地，如果同时放松个体同质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那么就需要在价值观决定的社会福利目标下，尽量使均衡资源配置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帕累托效率的统一。其中，什么是公平正义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如何实现帕累托效率是一个科学问题。因此，如何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是一个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问题。

构建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体系，是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① 1938年和1947年，亚伯兰·柏格森和保罗·萨缪尔森分别提出和阐释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将社会价值观体现在具体的函数设定之中。社会福利函数明确了公共政策应追求的目标，回答了“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千百年来，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自从罗尔斯发表其公平理论，尤其是《正义论》一书问世以来，“公平”与“正义”这两个概念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公平正义”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的思想流派却提供了迥然不同的解释。从放松个体同质条件出发，衍生出以下几种理论流派。

第一，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通过效用给出社会总体的福利评价。杰里米·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者认为，社会应当为最大多数人寻求最大幸福。^② 因此，功利主义下的政策目标是个体效用函数总和的最大化。功利主义下的平等基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如果一块钱给穷人带来的额外效用比给富人带来的额外效用更大，那么通过资源的再分配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效用总和。然而在现实中，功利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平等。这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功利主义并不以实现平等作为价值目标。在功利主义的政策导向下，可能会出现总体福利增加，但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情况。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功利主义除了在完全边际层面以外对分配问题毫不关心”，而“即使将效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2页，人民出版社，2015。

② 约翰·E. 罗默：《分配正义论》，1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用视为道德重要性的唯一基础，功利主义仍无法在平等要求方面获得总体优势”^①。其次，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假设不一定成立。比如，人们会受到收入提高的激励，从而为经济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最后，效用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在个体之间是不可比的。因而在现实中，功利主义的政策效果通常无法衡量。

第二，罗尔斯主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思维起点是找到“一种可能是大家一起做出的最一般的选择”^②。为了获得大家都认可的公平准则，约翰·罗尔斯进行了一个思维实验。假设在文明的初始状态，所有人都对自己将要到达的状态一无所知。他认为在这种被称为“无知之幕”的原始状态中，人们会特别关注处于分配最底层的人的状态。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应着力提升社会中状况最差者的利益。罗尔斯主义与功利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方面，罗尔斯正义理论追求的是“基本善”的平等，而不是福利意义上的平等。所谓的“基本善”，指的是“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想要的东西”，包括“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利、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③。另一方面，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政策应遵循“最大最小准则”，即使得最小效用值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总福利的最大化。

第三，资源平等理论。罗纳德·德沃金提出：“资源平等就是在个人任意的私有资源方面的平等。”^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以平等的条件进入市场”^⑤。因此，资源平等理论是一种倾向于机会平等，特别是起点平等的理论。于是，资源平等理论下的分配结果应该归结于个人责任，而与初始状态的天赋无关。资源主义与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福利主义的最大区别是，资源是一种客观的事物，而福利或者效用是一种主观的事物。根据资源平等理论，政府应致力于消除与个人努力无关的禀赋差异，让所有人的资源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个人选择与禀赋无关，因而不应该对人们后期行为造成的差异进行补偿。

第四，能力平等理论。能力平等理论将基本能力平等作为公平正义的衡量标准。所谓的基本能力，指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做的一些基本的事情”，包括“自由行动的能力、满足营养要求的能力、购买衣物和住宅的财力，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⑥等。阿马蒂亚·森注意到其他理论的局限性，因而提出了能力平等的价值取向。他举了一个跛脚残疾人的例子来进行说明。这个跛脚残疾人十分特殊，因为不论是获取快乐的能力、基本善抑或是资源，他都比普通人只多不少。因而，无论是功利主义、罗尔斯主义还是资源平等理论，都无法对他的状况进行改善。而根据能力平等理论，能够判断他的自由行动与参与生活的能力明显不足，因而需要提供轮椅、无障碍坡道等工具设施，帮助他克服生理缺陷。根据这一理论，社会政策应该优先保障基本能力的满足，从而实现人的多元化发展。

第五，持有正义理论。持有正义理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他们在分配下持有的财产，那么这个分配就是公正的。^⑦根据这一判断标准，正义与否在于分配过程而非分配结果。只要分配过程是正义的，那么分配结果不论是否平等都是公正的。对罗伯特·诺齐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来说，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如果平等与它发生冲突，那么平等必须给自由让路。^⑧就这一点来看，持有正义理论与之前的理论完全不同，天然地导向了一种机会平等的政策含义。即政府应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个体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获得应得的收入并实现成功。因为再分配政策通常以结果平等作为目标，而不是为了提升分配过程的正义性，所以再分配过程是不符合

①⑥ A. Sen. "Equality of What?". In S. McMurrin (ed.).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5-220.

②③ J.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Belknap Press, 1971, p. 13, p. 62.

④⑤ R.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5, p. 70.

⑦ R.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4, p. 151.

⑧ 姚大志：《平等》，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持有正义原则的。

在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分配体系，是实现帕累托最优下公平配置的关键举措。然而，关于如何构建合理的分配体系，学术界存在若干重要争论：一是普惠性与选择性社会福利模式的讨论。前者主张应为所有公民提供均等的基础福利，如推行全民医疗、普及教育等，来建设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后者主张应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如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贫困学生奖学金等，以提升资源分配的精确性与公平性。这两种模式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可能导致资源浪费、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而选择性的福利模式则可能滋生社会隔阂，诱发“福利污名”负面效应，折损受助者的尊严与积极性。二是关于再分配调节机制能否有效降低不平等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政府可以对社会财富的流向实施有效调节，从而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例如，累进税制以收入水平为基准实施差异化税负调节，直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转移支付则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兜底保障，有助于提升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然而，再分配政策的实际效果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实施强度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初期，财税政策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可能较为有限。^①另一方面，过高的税率和过大的再分配幅度可能抑制经济效率，削弱劳动参与积极性与内生投资动力，反而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产生不利影响。^②三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西方自由放任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实现产出的最大化，而分配问题应留给政治决策。^③他们将市场机制视为一种既正义又高效的财产配置方式，主张政府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与之相反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倡导者主张，市场失灵作为一种普遍且难以避免的现象，常常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此时，由国家在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不仅能够矫正市场偏误，还可以重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既要借鉴西方理论的有益经验，更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通过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应采用以下判定标准：价值观决定社会的福利目标，而社会福利目标的最大化要求价值观定义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客观的社会边际成本。这意味着，在实现福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应调整资源配置至一个均衡状态，使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匹配。首先，社会边际成本中蕴含着效率，这意味着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化的成果。这里的边际成本不仅包括私人的生产成本，还包括外部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社会边际成本最小化意味着在去除外部性情况下实现帕累托最优。其次，社会边际收益中蕴含了公平，这意味着合理分配现有的资源，以实现基于价值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价值观引导下的分配过程，是提高社会边际收益的重要抓手。最后，社会边际收益趋近于社会边际成本这一过程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会在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反映出各自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鉴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政府也可以利用税收、补贴、配额等政策措施，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价值观定义的社会福利目标。

根据实现公平的效率的判断标准，帕累托最优确保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社会价值观则框定了福利目标的具体形式。例如，当采用效用主义的福利函数时，追

① 陈斌开、李银银：《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2）。

② 徐建炜、马光荣、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对1997—2011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6）。

③ J. E. Stiglitz.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J. A. Ocampo, and J. E. Stiglitz (eds.), *The Welfare State Revisit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37.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5页，人民出版社，2013。

求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是公平的；当遵循罗尔斯主义的福利函数时，提升最差境况个体的效用值是正义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则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①应以这一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进而创造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从生产关系分析出发，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②。由此可见，对公平问题的探究需要结合生产中的效率问题，对合理分配的追求应兼顾激励下的财富创造。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还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与历史必然性，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④。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⑥。如今，作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是我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不仅意味着以吃穿住行为代表的物质富足，更是蕴含着文化、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精神富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⑦。因此，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升人民的整体福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意味着一个也不能掉队，意味着防止两极分化，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共同富裕为了人民，共同富裕依靠人民，共同富裕成果由人民共享。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富裕通过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共享发展，为人民谋幸福锚定着力点。坚持人民至上，共同富裕依靠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协调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聚焦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需求，共同富裕借助丰富精神生活、强化价值观引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总而言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不同于以往的理论流派，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在分配目标

①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2016（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99-1000页，人民出版社，200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人民出版社，1998。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495页，人民出版社，1999。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123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⑥⑦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求是》，2021（20）。

上，其他理论通常以个人的福利、资源或者能力平等为目标，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体现了对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共同追求。第二，在价值主体上，其他理论通常只强调个体价值，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则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极端个人主义或者精英主义倾向。第三，在发展理念上，其他理论很少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性，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追求实现公平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美好生活需要。第四，在国情适应性上，其他理论主要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则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深刻理解。需要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避免两极分化，推进共同富裕。第五，在历史传承上，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运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哲学智慧，调和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差异，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彰显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美”。

结合理论机制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市场原则。市场原则是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理解市场原则的重要性，首先需要厘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作用。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市场成为促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决定性力量。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价格不仅反映了商品或者服务的稀缺性，还映射了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市场机制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信号，促使市场主体优化自身行为。具体体现在，市场用利润引导企业进入退出与生产要素流向，用竞争调整商品与服务价格，用价格调节供求关系，最终使得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如果偏离了完全竞争的条件，应首先考虑健全市场机制。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培育市场主体等方式，识别并纠正导致市场行为偏离完全竞争假设的因素。在条件不允许，比如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才应该考虑价格监管等干预措施。而且，政府的相关政策不仅需要市场机制来实现，更是需要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评估与纠正，以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

依据市场原则，健全竞争与激励约束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①，“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②。一方面，市场的完全竞争是实现经济效率的理想条件。在存在大量买家和卖家、无市场势力，市场自由进出，完全信息的市场结构下，价格机制能够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竞争机制还可以助推技术进步，促进动态效率的提升。竞争压力促使企业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生产工艺改进，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因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实现经济效率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是确保个体或企业的行为与社会整体的利益相一致的重要手段。根据契约理论，可以制定各种机制和制度，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障碍，从而引导各方采取符合整体效率的行动。通过精心设计激励相容机制，促使信息持有者如实披露信息，以此为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指导。在激励方面，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例如税收优惠、补贴、荣誉奖励等，鼓励企业和个人采取符合社会利益的行为；在约束方面，通过建立法律法规、设立标准、给予处罚等措施，防止各类扰乱市场的不当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第二，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原则。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表明，不论如何理解公平，适当的分配过程总是能够帮助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这种适当的分配过程依赖于合理的分配政策。首先，分

^{①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6、10页，人民出版社，2024。

配政策应该符合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导向。于是,分配政策既要契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又要在求同存异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不仅可以助力经济目标的实现,而且能够提升社会凝聚力,持续地增进人民福祉。其次,分配规则的前置性和透明性至关重要。分配政策的前置性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之前,政府便已通过税收或转移支付等措施,将禀赋资源重新分配给适当的主体。分配规则的透明性则要求,相关政策必须公开、明确、开放、共享。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政策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而且能有效地减少对长期市场行为的扭曲。

依据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原则,建立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分配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有机统一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①在初次分配环节,着力实现价值观引导下的合理的初始资源分配。在再分配环节,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在不显著扭曲市场行为的前提下,累计税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除收入不平等之外,财富不平等也是影响社会公平的潜在力量。全世界范围来看,财富积累一般比产出或工资增长得更快,因此财富不平等要比收入不平等更加广泛和严重。^②对此,应及时使用税收、反垄断等手段,调节过大的资产差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除了税收之外,转移支付过程也应充分反映社会的价值目标。通过向低收入群体与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有效地提升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质量,减少社会中的贫困现象。此外,转移支付是解决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③作为转移支付的目标之一,教育机会均等化有助于提高代际流动性,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此外,在设计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时,需要谨慎考虑其对市场效率的潜在影响。在实际实施中,尽量避免过度干预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以保证市场机制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自由地进行资源配置。在第三次分配环节,塑造以社会价值观为导向的社会道德与社会文化,在道德力量与文化力量的共同促进下,激发自愿性的公益慈善行为。

第三,去除外部性原则。从理论上讲,理性的经济主体会依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准则做出决策。然而,外部性问题往往导致个体层面的收益和成本与社会层面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偏差,造成个体行为不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从而导致社会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当外部性被完全内部化时,个体决策将会考虑整体社会经济的收益与成本。其中,社会收益往往基于由社会价值观决定的福利目标,而社会成本则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问题。在纠正外部性后,个体行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将与社会层面相一致,从而使个体的决策符合实现公平的效率。因此,利用恰当的工具来纠正外部性问题,能够减少由产权不明、信息不对称或交易成本过高导致的福利损失,增进人民福祉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依据去除外部性原则,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政府的作用体现为纠正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资源配置偏差。首先,为了防止个体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或补贴的方式来内部化外部性,改善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也可以通过建立市场交易机制等方式,减少市场的交易成本。例如,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④。其次,为了防止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不足,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资金保障公共物品与服务的

①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35、40 页, 人民出版社, 2024。

②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2014, p. 571.

③ 范子英:《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9)。

供给，比如国防、基础设施和教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①。最后，为了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对市场定价造成的扭曲，政府可以完善反垄断规则制度，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不足或执行能力的限制，可能造成所谓的“政府失灵”问题。例如，在实施庇古税（如环境保护税）的过程中，政府可能无法确定负外部性的真实成本，从而无法进行精准治理。对此，市场机制具有弥补政府失灵的潜力。尤其是在信息分散且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价格的动态调整，市场能够有效地传递供需信息，从而避免政府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失误决策。因此，政策的实施过程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设计合理的政策框架，在遵循市场信号的前提下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确保政策的适时调整与高效执行。

三、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的实践路径

实现公平的效率的总体目标，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③。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进一步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提供了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去除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长远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首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⑤。推进一些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破除经营主体市场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进一步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价格机制指导企业进行生产和投资决策，从而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实现高质量供求平衡。其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我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一方面，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将促进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效率提升不仅来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还得益于企业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的优化。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扩大市场范围，实现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提高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之后，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强不仅能够提升现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还能推动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的创新，进而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最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压舱石与催化剂。一方面，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⑥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活动并开展创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信息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⑦积极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为超大规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健全企业破产法律体系，简化企业注销审批流程，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分配，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

^{①②④⑤⑥⑦}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9、8、7、7、9-10、10页，人民出版社，2024。

^③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载《求是》，2023（19）。

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①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劳动力市场法规制度体系,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的工资合理增长创造条件。此外,以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为基础,应积极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收结构”^②,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其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③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④。通过完善长效机制与制度创新,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此外,应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⑤。最后,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更为均衡地惠及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通过建立各类帮扶制度与补偿机制,使得收入再分配向农村、农民倾斜,帮助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稳定脱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⑥。着力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的忧虑,提高福利保障水平,切实提振城镇消费。另一方面,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框架,有效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⑦建立健全收益共享、成本共担机制,实现各区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第三,去除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首先,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降低全社会的要素流通成本。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是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⑧。要通过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 and 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通过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⑨其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要着眼于“全国一盘棋”,促使各个区域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达成共识,协同应对跨区域的负外部性问题。通过“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⑩,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地识别、评估和规避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通过“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⑪,进一步加强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控。加强重点领域反垄断监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助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最后,完善产权制度,加快构建归属清晰与权责明确的产权体系。在数据产权方面,明确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应用等环节中的权利归属与义务划分,为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制度保障。在碳排放权方面,通过“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⑫。用碳价指导减排的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全面转型。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方面,通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

①②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35、19、22、21、12、9、8、8、40、39页,人民出版社,2024。

③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载《求是》,2023(19)。

④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8、46页,人民出版社,2022。

制度体系”^①，推动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实现公平的效率的内涵蕴含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之中。实现公平的效率，指的是实现社会价值观所定义的福利目标的效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社会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同于其他的学术流派，在理论与实践上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价值观的基础上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并且构建合理公正的分配体系。其次，在技术层面上，实现公平的效率的判断标准包含在成本和收益的关系之中。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用以判断一项政策措施能否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识别相关政策在实践中是否有效，也需要精确比较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对此，应“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①，不断优化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度量机制，加强政策效果的评估与经济活动的精细化管理。最后，在实践层面上，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的实践路径体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理想情况下，市场机制能够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最大化社会福利。在偏离完全竞争条件的情境下，应首先考虑健全市场机制，识别并纠正导致市场行为偏离完全竞争假设的因素。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才应该实施干预来纠正外部性，以确保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的趋同。因此，制定政策时要以价值观为导向，实施政策时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从而有效率地实现社会福利目标。

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从供给侧入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打通生产环节的卡点堵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从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从需求侧发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促进消费优化升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区域、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差距^②，从而全面激发内需潜力。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兼顾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短期来看，社会中可能会出现效率和公平你高我低、水火不容的现象。经常出现的情况包括过度追求效率导致贫富差距变大，以及过度追求平等导致经济活力降低。^③ 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没有采取与实现公平的效率相关的政策措施，比如未能严格实施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或者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尽管实施了各种政策举措，但是由于社会重新达到均衡状态需要时间，造成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然而，当视角由短期扩展至长期，一个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社会是能够实现的。^④ 对此，需要坚持系统思维，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同时，结合政策实施的效果与人民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18页，人民出版社，2024。

② 王云杉：《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载《人民日报》，2024-01-22。

③ A. M.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 1.

④ A. Berg, et al.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8 (2): 149-166.

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各个阶段的目标和重点,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在市场原则、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原则以及去除外部性原则的理论指引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On How to Improve Efficiency in Achieving Fairness

LIN Chen, LIAO Yihan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at to further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we should regard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spearhead, and greater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increased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s our ultimate objectives.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efficiency in achieving fairness. Under the ideal conditions of a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 it is possible to unify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market failur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airness is an issue of social values, while efficiency is a scientific issue based on social values. The values embedded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e people-centered and guided by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goals of social welfare determined by social value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build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mplement a distribution approach oriented toward social values, eliminate externalities from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irness and justice; Efficiency;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责任编辑 王伯英 责任校对 王伯英 张 静)